

# 关于肖田问题

——答张雪明同志

张 政 烺

《武汉大学学报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，登载张雪明同志的《释尼田——与张政烺同志商榷》。最近，我才见到这一期学报，既蒙张雪明同志不弃，把问题提出来要进行商讨，我理应回答，以下就该文的顺序谈几点。

原文说：“《说文》肖‘从肉小声’，值得重新考虑。”又说：“从宀肖声的宵，金文作或作（见《宵簠》），肖字从月而不从肉是明显的。从肉既与金文不合，又说不出肉和夜有什么内在联系，《说文》既训宵为夜，从月是对的。……肖字，根据更早的金文偏旁，当为从月小声。”今按《宵簠》的宵字是人名，其本义不可见，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字形意义不大。就算是从宀肖声吧，这里的肖和肖似的肖不一定是一个字。《说文》“肖，骨肉相似也，从肉，小声”，讲的是小篆，但这个字形源远流长。十多年来，山西省侯马市发掘春秋后期晋国都城遗址，得到“三家分晋”的赵家的盟书很多，几百上千，一九七七年曾编印过一本《侯马盟书》。这批盟书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九七——四九〇年间。其中赵字出现的次数太多了，大部分简写作肖，而无论肖或赵，都从肉不从月。比此稍晚的《禹邶王壶》（公元前四八二年），有赵字（见《金文编》，151 字号）亦从肉不从月。再晚一些

的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帛书，其年代篆书的可以早到秦、隶书的亦不晚于公元前一六八年，其中有许多肖和赵字，都从肉不从月。古代石刻文字有一些是篆书的，如《群臣上寿刻石》、《少室石阙》、《开母庙石阙》、《赵宽碑额》、《正始石经》等，其中皆有赵字（见《石刻篆文编》卷二第十六页），也从肉不从月。这些材料都与《说文》相合，说明许慎的意见是有来头的。从《侯马盟书》到《说文》整整是六百年。一个字使用了六百年，应当承认它有作为文字资格。肖字本身并不必和夜有什么联系，古人既不用它表夜，许慎也不说它是“夜也”，我们根据什么要它一定从月？所以我的意见，肖是肖似的肖，和《宵簠》的宵没有关系。早在一九五九年第三期《考古学报》上，曾发表过徐中舒同志《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》一文，其中有一段讲到（肖）即肖字，今引于下。《禹鼎》铭文：

禹曰：丕显桓桓皇祖穆公，克夹绍先王，莫四方。肆武公亦弗假望朕圣祖考幽大叔、懿叔，命禹（肖）朕祖考政于井邦。

重要在这后一句，把用作肖。徐中舒同志说：

肖，从小，从反人，当为肖或肖之异文。  
肖与肖并从小声，从人与从肉同意。

《列子·杨朱篇、力命篇》肖又从人作肖。肖、法也，似也，教也。

又说：

《禹鼎》称其祖为幽大叔，考(父)为懿叔，……他们都是世代掌管井邦的采邑主，故鼎称禹肖朕祖考政于井邦。

徐中舒同志这个说法是对的，我在一九六三年写肖田一文的初稿时曾引用过，后来《甲骨文编》新版发行，我改写时为了节简字数把它省去了。《禹鼎》的年代，学者多定为周厉王时，即公元前八五〇年左右，这个肖字对于了解甲骨文肖字字形的演变，和《说文》肖字“骨肉相似”一义的来源，还是很重要的。甲骨文变为育，为肖，这是个字形问题，是个书写习惯问题，都把人形变成肉形，所以我说其演变完全相同。古代写字的人不一定是文字学家，在一个年代里，或一种行业里，常会出现一种类似的偏旁走向统一的现象，我称它为字形的“同化作用”，何况人和肉还是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啊。从发展演变的角度看，基本上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，这当然是不合理的，但是它既存在于古人的字迹之中，就必须正视它。早在殷周时，从亻的偏旁常变作，如兄作（见《甲骨文编》1065号字，《金文编》1146号字），长作（《矢令簋》，见新版《奴隶制时代》图版三），这和育、肖的变化有些类似，后来却没能通行，它为什么出现，又为什么消灭，也不容易说明白。

原文说：“象人拉大小便的形状，……疑为尼的初文。也即便溺的溺字的本字。”这里“拉大小便”四字语义含糊。大便、小便是两种动作，应该区分。作者的本意说是撒溺，并认为是个“象形表意字”。不过甲骨文中没有象撒溺之形的字，如

（见《甲骨文编》4262及4263号字）象立着撒，金文有（见《金文编》第八一三页）象蹲下撒，两者都象撒溺，其共同点是把溺画成一条断续的线，冲向前方。以与甲骨文字相比，可以看出不是象溺，那么也就拉不上尼字的关系了，何况尼与溺古音也并不相近。古文字中自有尼字，十多年前于省吾同志曾写过一篇《释尼》，发表在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上，何年何期我记不得了，可惜手中无书，不能加以分析介绍。

把释为溺既不能成立，释为拉屎亦说不通。拉屎不能三条并下，如果说是拉稀屎，则是变态，没有典型意义，怎么会按照这个形象来造字呢？问题回到屎字上，则是老问题，不是新问题。张雪明同志举的一些文献，有些我确未见过，有的见过印象不深早已忘记了。有的则是有意地避开了，譬如郭宝钧同志和我相识三十多年，在他生前不曾就此交换意见，现在我何必为此去反对他呢？

总之，作为文字屎溺不能混为一谈，作者的主题是讲，疑为尼的初文，为便溺之本字，文意甚明，接着却说“甲骨文中的尼田，过去的学者理解为粪田，或说施肥于田，是正确的”，已觉概念不清。然后又说：“学术界已大致确定田为粪田施肥，只不过读尼、读屎、读粪、或隶定作有所不同而已”，这就弄得更加混乱了。我认为决不是“象形表意字”。那么，以人和小二字组成，不是会意字便是形声字。如果把它当作会意字，人小是什么意思？今无其字，又和《说文》《广韵》等字书里的字对不上号，在卜辞中也讲不通，所以我断定它是形声字。赵字从走肖声，肖字从肉小声，和亻字声符相同，所以我

初步读作赵。再从字形考查，𠂔可变为育，𠂔自然也可变为肖，所以我释𠂔为肖，这是我考释这个字的思想发展过程，老老实实地摆出来，请学者批评指正。

作者在第三大段的《尼田说》中说：“只说十三月的殷都所在的北方，应是冰天雪地、冻土三尺的时候了，怎么能说是‘刺草除田’？处于隆冬，田间农活少了，殷代的农人主要从事积肥、或者送肥下地的工作。”关于这一点，我的意见恰好相反。卜辞十三月肖田，我在文中曾有说明，大约因为叙述分散被忽略了。现在再引一点上次未引的材料，《管子·小匡》（尹知章注）：

令夫农群萃而州处，审其四时权节（于四时中又权量其节之早晚），具备其械器用（械器皆谓田器），比耒耜耨芟（比偶其耒耜及耨芟。耨芟小于耒耜，一人执之，以随耒耜之后，重治其闾遗），及寒击槁除田，以待时乃耕（冬寒之月，即击去其草之槁者，修除其田，以待春之耕也）。……

这段文字和上次引的《国语·齐语》差不多，上次引了《齐语》便没引它。“及寒击槁除田”的寒字，这里的尹知章注说是“冬寒之月”，《国语》韦昭注“谓季冬大寒之时

也。”商代以建丑之月为岁首，十二月是冬至之月，即农历的十一月，正月是农历的十二月。十三月在这两月之间，约相当于农历十一月的下半月和十二月的上半月，即冬至日之后、大寒日之前的三十天。现代北方人习惯数九，这也就是头九、二九、三九加四九的前几天。这是一年里最寒冷的天气，古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斫伐草木呢？这是天气最冷最干，草木容易折断，害虫卵容易消除，应是最大原因。无论如何这是事实，据现有材料知道从商王武丁时到东周，六七百年都是如此（参考拙文《卜辞袁田及其相关诸问题》第二章《袁田考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一九七三年第一期）。如果说十三月肖田是送粪或施肥，则很难理解。数九寒天，大风飞扬，雨雪交加，地冻路滑，这时送粪到田间，既不便封存，也不适于分撒，无论是屎是溺都会损耗，如果是施肥，动劳既艰辛，效果也一定不好。我查了许多书，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，所以我终不信从。

以上是我对这个“商榷”的回答，向张雪明同志请教，并请《学报》的广大读者指正。

#### （上接第49页）

而作者多矣，乃世上往往好称唐人，何也？则其所托兴者深也”。“读宋而下诗则闷矣，其调俗，其味短，……彼宋而下何为，诗道其亡乎？”由此可见，比兴不仅是一个表现手段的问题，而是牵涉到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的问题。

我们简单地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，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，一反唐人规律。但这是就唐宋诗歌主要倾向而说的。我们并不否认唐代某些诗人的作品，也有缺乏感情、缺乏形象，以议论见长，以文

为诗的。如韩愈的某些诗，就开了宋诗发议论的先导。同时，我们也不排斥宋代有些诗人采用了比兴、借助了形象，反映了现实生活，抒发了感情，写出了较优秀的诗歌，如梅尧臣、苏舜钦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陆游、文天祥等的某些诗歌即是。

本期因篇幅关系，刘绶松遗著《论子夜》一文将在下期续完。

编者